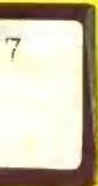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作家 与东西方文化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

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

吴小美 等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甘肃省定西地区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75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2千字 印数：1—1,500

ISBN7-311-00319-9/G·105 定价：2.12元

前 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段精辟的论述也包含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势。中国现代文学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同时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作家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择取东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加以利用和创造，铸成新型的文学。基于这样的史实，我们选择了“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的研究课题，从几个不同点上作些探索。

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视角上，但又绝非离开现实生活，离开各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的孤立的纯文化分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现代作家的研究大多仅仅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上。现代作家总是或远或近的同政治相联系，但是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往往更多的是全方位的反映人类文化生活，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一个作家，尤其是具有开放性格、吞吐能力的优秀作家，就是一个联结着、交融着、综合着东西方文化基因的复合载体。因此，广义的文化学的研究无疑是对狭隘研究格局的拓展。

研究作家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就离不开比较文学的方法，但是我们又力求不局限于比较文学的范围，不停留在浅层的类比上，而更注重综合的研究，以期探寻文化的深层内蕴。

在研究的层面上，追求一种立体的效果。在整体把握的同时，又较多的集中在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宗教、哲学的层面，同时又兼及民族学、伦理学、美学等层面。既注意接受主体何以摒弃东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而取其另一些因素，寻求作家文化选择的外部条件和内在机制；又注意考察作家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层面，寻求作品赖以产生的潜文本，将作者系统、作品系统及社会历史文化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跳出单一的或作者系统、或作品系统、或社会历史角度的框架。

以上便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研究这样的课题，需要博大精深的学识，需要宏观视野与微观洞察的结合，我们自知水平所限，为自己悬定的目标未必实现。殷切期望读者和专家指正。

本书的执笔人：《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张建生；《郭沫若的泛神论与东西方文化》，林恭寿；《老舍与东西方文化》，吴小美、魏韶华；《冰心与东西方文化》，王喜绒；《闻一多与中西诗论的融合》，常文昌；《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沈从文》，赵学勇；《中国的“零余者”与俄罗斯的“多余人”》，王喜绒；《朱光潜与中西诗论的融合》，常文昌。附录《比较文学的开放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放》，吴小美、魏韶华。全书由吴小美统稿。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得到兰州大学科研处和兰州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谨表谢忱！

一九八九年 岁末

目 录

前 言

- 鲁迅与东西方文化..... (1)
- 郭沫若的泛神论与东西方文化..... (50)
- 老舍与东西方文化..... (76)
- 冰心与东西方文化.....(142)
- 闻一多与中西诗论的融合.....(160)
- 东西方文化交汇中的沈从文.....(176)
- 中国的“零余者”与俄罗斯的“多余人”(220)
- 朱光潜与中西诗论的融合.....(233)
- 附录：《比较文学的开放性与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的开放》.....(249)**

鲁迅与东西方文化

人的解放的深层内涵，是构成人的本质的文化特征的转换与重构，而这，正是鲁迅思考现代中国命运和发展的根本命题。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基本特征，不仅表现在其与现代中国政治解放的紧密联系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其政治意识向文化意识的自觉转换上。与此相联系的是对中国诸问题的整体把握与局部把握的分离，对传统文化在异常意义上的深刻理解和阿Q文化模式的典型概括。

我们往往习惯于在各种意义上对各种现象做政治估价，非政治估价本身在当代中国就是一种极其深刻的观念更新。为了一般地了解鲁迅从政治意识向文化意识的自觉转换，首先要强调的是下述四点：（1）20世纪中国文化进化的一般特征；（2）学界对我们论题认识和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特征；（3）鲁迅接受、融化、传播西潮的多层面特征；（4）文化人格是鲁迅基本的人格属性。

20世纪中国文化进化的根本特征是特殊进化占压倒优势。换言之，20世纪中国发展的总危机，已不可能在自身文化系统内通过渐进达到提高自身的等级来加以克服，而必须借助西潮来加以替换、更新和转化，才能达到进化和克服自身危机的根本性目的。因为标志20世纪现代世界文化水准的，一是以现代自然科学为代表的无与伦比的空前的能量摄取水平；一是以现代人文科学为代表的对人自身特征的空前的深刻认识。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的迷惘和憧憬，正在变为愈来愈自觉的空前深入的理论实践，并取得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科学成果；个性解放和自由不仅是

外在的社会政治形态的，而且是人本体内在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越来越具有普遍的思维方法的意义。人文科学的一系列新学科都是依赖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与成果建立起来的，或者是两者交叉的边缘地带产生出来的。所有这些，依赖中国封闭的传统文化的自然渐进，是很难企及的；即或能够企及，那也是一个既缓慢又漫长的过程，而迫在眉睫的救亡危机，使这种自然渐进完全失却了外部和内部条件，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同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进程，尽管越过了资本主义阶段，但文化的进程，却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就现代文化的基本性质来说，是以民主和科学作为自己的标志的，它不可能自发产生于封建主义母胎中，一定意义上的“西化”是不可避免和逃脱的。20世纪中国文化的进化是特殊进化意义上的进化。

从方法论角度对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学界一般着眼于鲁迅自己阐明的“拿来主义”，从借鉴与批判，继承与革新的辩证角度，突出政治色彩，论述鲁迅吸收西潮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但应该看到，历史唯物主义常常是被作为政治尺度来运用的，“拿来主义”本身也常常被论述者政治化了。论述是以对历史唯物主义过份的简单化和狭隘化为前提的。这主要体现为把鲁迅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比较文学的范围里加以研究，而且这种比较研究基本上是分类比较。一种是按国别分类，如鲁迅与俄苏文学，鲁迅与日本文学等；一种是按作家分类，如鲁迅与陀斯妥也夫斯基，鲁迅与尼采，鲁迅与弗洛伊德等等；一种是按流派和思潮分类，如鲁迅与西欧浪漫主义，鲁迅与现代主义等等。虽然这些研究在整理材料、理清线索诸方面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在综合水平、总体论、新方法的吸收诸方面，尚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高度、深度与广度。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总体论、系统论，

综合才是它的最高思维形式；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又是一种天然的发展论和全方位的开放论，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应该用不断出现的新的学科和哲学派别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整体性，而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浅层的分类比较水平上。

鲁迅与东西方文化的密切关系，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展开的，而是在内化认同、外显认同、功能认同的不同层次上全面展开的。所谓内化认同，就是由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所构成的他自身的人格形式；所谓外显认同，即是一种非人格形式的外在认同，即某些文化形态虽然得到了鲁迅的认同，但它对鲁迅的影响只是一种浅层的外在影响，远未深入到他深层的人格形式之中；所谓功能认同，是指鲁迅着眼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意义上的翻译以及介绍等等具体活动。三个层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由东西方文化交汇、冲撞所形成的鲁迅的独特的人格形式，强化着他对东西方文化的外显认同与功能认同，而外显认同和功能认同又往往构成其内化认同的基础和起点。同时也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外显认同和功能认同都能转化为他的人格形式，都能成为一种内化认同。这里涉及到对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不同的价值判断。一是新文化创造者的价值；二是引导者的价值；三是传播者的价值。作为创造者的价值，我们关注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如何构成了鲁迅世界与鲁迅自身；作为引导者的价值，我们关注的是鲁迅对某些文化形态的释义；作为传播者的价值，我们关注的是鲁迅在翻译和介绍中外文化作品的巨大的、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混淆这三种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鲁迅与东西方文化的联系作出深刻的科学认识。鲁迅对某些文化形态与文化人物的外显认同，即其作为引导者的价值，和他作为创造者的价值并不总是一致的，某些外显认同对他的内化认同的影响常常极弱，而某些外显认同（包括早期认同，后期认同），往往在他一生的人格

形式中打下了不能磨灭的深刻烙印；而作为传播者的价值，也往往与他作为创造者的价值很不一致。相对于“五四”时期，30年代他作为传播者的价值无疑达到了颠峰，而此时他在传播中所形成的创造价值，显然低于“五四”时期。基于上述理由，当我们着重从创造者的价值来关注鲁迅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时，就必须谨慎对待鲁迅作为引导者的价值，也就不一定非得把它跟鲁迅作为传播者的价值取向同步看待。一句话，必须把鲁迅的独特的深层文化构成，跟它的表层政治意识在联系之中区别开来。

弗·杰姆逊教授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指出：“第一种文化是精神、心理方面的，是个人人格形成的因素，而第二种是社会性的，日常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是社会形成，第三种则是一种装饰。”显然，单纯的政治角度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足以涵盖文化的深刻特征，不仅如此，而且政治本身也只有在文化背景与格局中才能得到深刻认识。由此出发，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和瞿秋白同志对鲁迅的经典性评价的局限性，因为这种评价是从单纯的政治角度做出，而没有充分考虑到鲁迅作为一代文化伟人的根本属性以及文化本身的基本特征。由于政治视野的表层性（政治不是社会和文化的深层结构），它不可能独自充分揭示出鲁迅人格特征在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层面上所具有的广泛深刻的文化联系，从而使鲁迅显得过分政治化和教条化，缩小了鲁迅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深度与广度。国内、海外和港台对鲁迅的某些贬低，以及鲁迅在长时期内被作为政治工具利用，其根本原因都是把鲁迅政治化的结果。我们是从肯定的方面把鲁迅政治化，而另外一些人则从否定的方面把鲁迅政治化，两者虽然在本质上不同，但在对鲁迅文化活动的深度与广度的估计不足，对鲁迅作为中华民族一代文化哲人的地位估计不足，判定鲁迅的基本特征仅是在政治上，却是相同的。因此，单纯地从政治上抬高鲁迅和解释鲁迅，把鲁迅完全政治化，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

的短视眼光，它在更大范围和更为长久的历史行程中给鲁迅带来的是贬低，这是鲁迅研究中的严重教训，也是现代中国政治崇拜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鲁迅是一代伟大的文化哲人，是极其深邃的文化现象，对鲁迅这一根本属性的认识，已经由人民覆盖在他身上的“民族魂”的大旗作了盖棺定论，已经由蔡元培先生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赞誉作了最精辟的概括，已经由新时期深刻的文化反思与鲁迅精神的联系作了最有力的证明。

从特殊进化，即一定意义上的“西化”入手，突破简单分类的比较研究定势，关注鲁迅作为新文化创造者的根本价值，抓住鲁迅作为一代文化哲人的根本属性，是本文研究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一 从政治意识向文化意识的转换

鲁迅最初跟传统的决裂，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就是跟政治意识向文化意识的转换这一特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传统的批判和对西潮的吞纳，在“五四”前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不动摇封建政治，在封建政治的范围里接受西潮和对传统文化进行一定的批判；一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摧毁封建政治为基本目的，从政治入手吸收西潮和批判传统。尽管两者在政治态度上是根本对立的，但他们从政治入手批判传统和接受西潮的态度则是一致的。鲁迅则与他们不同，他是从文化入手，即通过对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在文化意义上的彻底否定，对西潮进行择纳的；他是以文化为主体的，他包含政治目的，但政治目的绝非他的基本目的，他的基本目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把鲁迅与康有为、孙中山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就是鲁迅从文化与政治

分离的意义上对传统的批判、对西潮的择纳。这一特征集中表现为鲁迅早期自觉地选择“科学救国”，尔后又对改造国民精神结构的再三强调和不遗余力的亲自实践。也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鲁迅对科举制度摒弃的深层意义。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客观上断掉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仕途，读书从政、学而优则仕已不复存在，许多知识分子是被逼提笔当作家的（其实后来不是就有些作家一旦有机会又去从政了么?!）而鲁迅则不然，作为一代文化哲人的精英，他对科举制度的摒弃是主动而非被动，是自觉而非被迫，因为他在从政和从文这两条道路之间，在政治意识和文化意识之间，已经自觉地、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并坚信较之前者这是一种更为艰难、更为深刻、更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选择。事实上，鲁迅终其一生始终坚持了他的这一最初选择，而从不曾有任何的动摇。因此，从坚决摒弃科举应试，到高扬“科学救国”的旗帜，再到走上“改造国民精神”的道路，所表明的不仅是鲁迅与特殊从政（科举）的分离，而且是与一般从政的分离，是从政和从文的分离，是文化视角跟政治视角的分离，是文化意识跟政治意识的某种分离。

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鲁迅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独特内容、格局和形态。

一般把“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裂，只看成是“左”派和右派的分裂，鲁迅自己也认为是“右派”、“左”派和中间派的分裂，即“有的退隐，有的高升，有的前进”，但这只是一种从政治角度，以政治标准所作的划分，其实它还具有更为深层的文化与政治、文化自身分离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只是注意这种分裂的共时性内涵，而且同时关注它的历时性特征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鲁迅自己始终处在这一分裂的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这次分裂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早期共产党人走上政治道路，和由接受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的个性主义者走上文化道路为标志的。一般又认为在这次分裂中，鲁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者一边，站在政治一边，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是1918年1月当《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移至北京时，由陈独秀、李大钊、刘复、沈尹默、钱玄同6人编辑，6人曾约定“不谈政治”。尔后由“五四”运动到1920年，《新青年》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文章，并又移至上海出版，因此引起编辑部内部的分歧。1920年底或1921年初，胡适曾就此问题致信编辑部同人，提出解决问题的三点办法：（1）《新青年》保持其政治的特色，另创一没有政治色彩的刊物；（2）迁移北京，不谈政治，谈学术文艺；（3）停办。鲁迅代周作人的复信中，说周作人同意第二种办法，而鲁迅谈自己意见时，也表明同意第二点。并且指明“此后只要学术思想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而某些研究者仅摘录此信一句话“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就断定鲁迅是主张《新青年》谈政治的，显然有失片面。因此，我们以为《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对于鲁迅来说，是坚持一定程度的与政治相分离的文化立场。在经历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之后，鲁迅又经历了与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派的分裂，以及跟周作人日渐加深的分歧，——因周氏兄弟都曾是“五四”新文化阵线的中坚，所以他们由分歧到绝裂，对于说明“五四”新文化战线的分裂，无疑具有典型性。——表面上看来，这两次分裂或者是政治路线的分裂，或者是文化路线的分裂，但其深处仍然蕴含着一定程度的文化与政治的分离。对鲁迅来说，这种分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胡适的“整理国故”具有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明确目的和鲜明倾向，因而带有强烈的反动政治的政治特点，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与胡适的分裂，带有进步文化与反动政治相分离的特征，它在文化意义上则是“西化”与传统的对立。胡适主张“整理国故”，

而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周作人力倡“中庸”，而鲁迅则主张“拿来”西方“轨道破坏者”的精神。另一方面是鲁迅与胡适、周作人的分裂，即进步文化与反动政治的分离，本来可以使鲁迅达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完全融合，但鲁迅却不然，他仍在跟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密切联系中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文化个性和独特的文化视角，仍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单纯政治活动，鲁迅始终没有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鲁迅在坚持进步文化与反动政治的分离时，同时保持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一定距离。总之，鲁迅从强调科学技术到强调“立人”；从重视科幻小说到崇拜西欧浪漫主义，再到醉心于俄罗斯现实主义；从学医到弃医从文；从翻译小说到创作小说，其间所留下的由政治意识向文化意识转换的轨迹，在鲁迅与康有为、孙中山的不同之中，在“五四”新文化阵线的分裂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

这种分离对于鲁迅乃至整个现代中国在中西文化的汇合与冲撞中，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揭示了鲁迅对中西文化的抉择的什么特征和内涵？

这里所涉及到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中国的特殊发展和进化问题，也就是一定程度的“西化”问题。现代中国从总的倾向来看，“程度不同的西化论是主流，本位论虽有几次回潮，但并没有改变西潮的大趋势，至于折中论及调合论，因为一厢情愿的意味太重，就更显得软弱无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也是西化论战胜本位论的例证”^①。但是一定程度的“西化”，在中国现代历史行程中，并非单向而是多向的，有时甚至是逆向的，多向性正是构成鲁迅文化与政治分离的基本原因之一。首先是不同社会结构方向的西化，其次是不同传递方式的西化，再次是不同精神气质方向的西化。

从社会结构看，中国一定程度的西化进程是沿着社会政治和

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双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鲁迅正是后者的典型代表。鲁迅所主张的“拿来主义”和对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的消化，主要不是建立在政治基石上，而是建立在发掘古典传统和现代心灵的深度上。尽管鲁迅的文化活动，跟现代中国的进步政治始终保持着同步发展的紧密联系，在客观上，他仍然是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但是，这种联系在功能结构上，仅仅是鲁迅文化活动的多元功能的一种功能表现，并不能覆盖其多数功能层面和方面，因此，它不是与政治融合意义上的联系，而是与政治有区别有距离的分离形态的联系。其次，这种联系从主体参与方式上看，它不是主体直接参与政治的结果，而是主体参与文化活动的结果。再次，从客体特征看，构成这种联系的本体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政治性只是对文化本体的某一独特功能的转借。这一特征决定了鲁迅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主要是跟改造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即跟批判国民劣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主要不是跟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以《狂人日记》的创作看，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主要是医学、文学、心理学和文化哲学，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政治意识；同时，他也不是从政治角度去吸收蕴含在上述文化中的思想精神的，而是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吸收其思想精神的。《狂人日记》的政治作用是在转借上述文化含义的意义上产生的，接受和影响都是文化本体意义上的，而并非政治本体意义上的。他归结《狂人日记》的创作为接受“百来篇外国作品”、“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尼采的“人还尤其是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以及“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创作动机^②，就有力地证实了这点。

显然，沿着政治方向接受西潮，并使之政治化，和沿着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方向接受西潮，并使之用以改造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层次、广度和深度上是不一样的，这正是鲁迅的文化道路和马克思主义者政治道路相区别的实质之所在。这正是在中国近

现代史上，鲁迅之所以是最深刻的原因之所在。因为事实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极端政治化，或者从单一的政治方向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虽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却同时蕴含着狭隘性，中西文化汇合的基础不应该仅仅是表层的政治基础，即便是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从单一的政治需要去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仅马克思主义本身会被绝对化、终极化、片面化和狭隘化，而且在进步政治的旗帜下，使人们容易忽略旧传统文化结构的强大的消极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我们自以为用马克思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时，实际上却是用封建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

从传递方式上看，中国一定程度的西化进程是沿着纵向的祖、父、孙三代相承的“前喻文化方式”，和横向的同代人互补、互学的“并喻文化”方式进行的。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指出，“前喻文化”是一种“老年文化”，是以长辈为本体的文化传递方式，而“并喻文化”则实际上显示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完全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而对于老一代来说，他们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新世界中成长的需要。这两种传递方式，在“五四”时期分别由胡适、周作人与鲁迅为代表。应该说最初胡适、周作人等人是最坚定的“西化论”者，他们完全是以“并喻文化”的方式传播西方文化，推动中国的新文化进程，在这个时期他们和鲁迅是一致的，都代表了年轻一代的文化心理要求；以长辈为代表的传统，不是他们的偶像，他们尊崇的是马克思、列宁、易卜生、尼采、佛洛伊德、波特莱尔等，正是这种横向的对西潮的全方位开放，形成了他们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模式。胡适、周作人与鲁迅的分离，是在于胡适后来把西潮作为一种工具来“整理国故”，即从“前喻文化”的角度传递西潮，进行变革。周作

人也同样，他后来力主“西方文明”与孔孟“‘本来的礼’与‘本来的中庸’的复兴”相统一的境界^③，就是有力的证据。其实，从单一的政治方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也是一种以“前喻文化”的传递方式实现一定程度“西化”的过程，——因为它往往忽略了涵盖全体社会成员的传统文化，以表层的政治差异掩盖了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相同。阿Q打倒了赵太爷，赵太爷的文化心理仍保持在阿Q主义之中。应该说在社会范畴中，“前喻文化”总是维护和适应现存政治统治的巩固和需要，和政治联系十分密切；“并喻文化”只在特定情况下显示为政治冲动，而在更多情况下是改建、转换旧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以鲁迅为代表的“并喻文化”传递方式，是贯穿鲁迅文化意识与政治意识一定程度的分离特征的主线。

从精神气质看，鲁迅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进化的坚持，即对一定程度西化的坚持，对文化与政治一定距离的坚持，体现着他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精神的转变。现实主义精神气质，是现代中国中西文化汇合的精神气质基础。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往往把这种汇合引向单一的政治方向，而现实主义精神气质，才能使这种汇合具有真正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征与层次。

从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向现实主义精神气质的转变，是鲁迅对近代中国政治革命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的结果，是对“西化”形态反思的结果。既然单靠吸收西方自然科学，坚甲利炮，仍然避免不了甲午海战的失败，而高超的医术，只能增加毫无意义的“看客”和“示众材料”；既然革命在阿Q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令人感到绝望，由这种革命产生的“民主”议会和新的统治者，也只能是阿Q式的代表和比阿Q更糟的政治统治，那么，改造国民社会深层文化程式，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人们可以说这是鲁迅思想认识的局限，但这一思想的深刻性仍然无法驳倒。建

国以来一系列失误的教训，新时期持久不衰的愈来愈深入的文化反思，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这一点。正是这些，促成了鲁迅由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向现实主义精神气质的转变，促成了他政治意识向文化意识的“战略转移”，促成了中西文化在他身上结合的独特形态。

当鲁迅执着于浪漫主义激情时，他所推崇的诗人都是政治诗人，表现了他对充满政治激情的革命活动的憧憬与向往。《摩罗诗力说》全面介绍了拜伦、雪莱、密茨凯维奇、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他们大都是一些革命战士，是积极的政治活动家。拜伦曾参加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希腊民族独立战争，雪莱曾参加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密茨凯维奇是争取波兰独立的革命战士，裴多菲参加了1848年3月15日布达佩斯起义，反抗奥地利统治，次年在与沙皇军队的战斗中牺牲，……。因而，浪漫主义，对鲁迅来说首先是意味着政治斗争，其次才意味着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鲁迅以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对西欧浪漫主义作品的接受，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文化目的。这一方面丰富和强化了他的革命意识，另一方面却限制了他的文化创造。浪漫主义精神气质跟他本人的个性与文化气质是不大吻合的；同时他把浪漫主义文学理解为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也使他无法从更灵活、更广泛的文化创造视角去借鉴和吸收它们。所以，这个时期鲁迅除了数量不多的翻译作品和政论外，文化创造的实绩是不大的。当鲁迅经历了对政治痛苦的文化反思之后，对当时的政治感到“怀疑”，从而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取代了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从对政治的关注转而主要关注民族文化心理程式。此时鲁迅对西潮的接受，已经主要不是政治层面，而是文化层面了。其重点也不再是那些政治诗人和诗人的政治，而是那些对深层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反思的哲学家和作家。从诗歌转向小说，从文学转向哲学，从政治转向文化，从社会政治结构转向社